

“左联”党团书记考论

田建民

【摘要】在对“左联”当事人的回忆进行分析互证并参考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证出左联党团书记的先后任职次序与任职时间:1930年3月至1931年2月为冯乃超;1931年2月至1932年1月为冯雪峰;1932年1月至1932年四五月间为阳翰笙;1932年四五月间至1932年六七月间为钱杏邨;1932年六七月间至同年末为耶林;1932年末或1933年初至1933年5月为丁玲;1933年5月至1936年春为周扬。

【关键词】左联;党团书记;考述

【作者简介】田建民,河北大学文学院(071002)。

【原文出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京),2023.9.99~112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鲁迅年谱长编编撰与家世生平资料整理研究”(项目编号:21BZW028)的阶段成果。

引论

“左联”成立后虽然选举产生过多届执委会和常委会,但却不像现在的社团组织明确地选举领导者或负责人,而是像夏衍所说左联“实行了集体领导,它的组织,只有一个执行委员会”^①。左联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执委会或常委会,但由于其执委会和常委会没有明确的负责人^②,甚至连“召集人”或“牵头人”都没有,所以这种“集体领导”是有赖于左联的党团组织才得以实现的。也就是说,是左联的党团领导人依据中共中央宣传部下设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的指示精神,负责发起组织执委会、常委会开会,传达讨论党的相关方针、政策并制定出左联的相应的落实计划与行动方案,然后交付左联秘书处具体实施与执行的。由此可见,左联的党团书记决不仅“是联系文委与左联常委,起个桥梁作用”^③,而是代表党领导左联的实际领导者,其在左联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左联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成立的一个群众性文艺团体,它不像现在的社团机构可以公开以规范的档案制度来保存档案材料。特别是左联的党团书

记,当时对外是保密的,由此,了解左联的相关情况,现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当事人的相关回忆。1980年前后,《文学评论》《新文学史料》等权威期刊,集中刊发了一批左联当事人的相关回忆文章或对他们的采访录,但这些时隔半个世纪左右的当事人的回忆,其中难免存在一些错漏颠倒,与事实不符的情况。如果在使用这些回忆材料时不进行比较、分析和甄别,就很可能出现错误。这种情况比较突出地表现在一些作家的年谱、传记类的著述中。考证清楚左联党团书记的具体任职情况,这不仅是个文学史的问题,而且是从根本上解决和消除相关传记类著作中彼此相互抵牾混乱记述的一个重要途径。那么,当时都有谁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他们的任职情况是怎样的?对此,王宏志、姚辛、周国伟、王锡荣等学者或有涉及,或进行了专门的考论与研究,有些问题已经大致弄清楚了。但也还有一些问题或是根本没有解决,或还留有悬念。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史料的进一步挖掘与辨析,考稽左联党团书记任职的具体情况,对一些尚未解决的悬疑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一、当事人回忆的互校与辨正

就左联党团书记的任职情况,冯雪峰和阳翰笙在回忆中对此谈得较多也较具体,二人都大致给出了先后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的人员及相应的任职时段,虽然所谈的情况不尽相同甚至有抵牾之处,但可说是大致勾勒出了当时左联党团书记的任职情况的基本概貌。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基本上都是在冯、阳二人提供的材料的基础上对左联党团书记任职的具体情况考证、分析和判定的。

1973年8月3日,在接受中山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教师采访时,冯雪峰对左联党团书记及文委书记的任职情况回忆说:

左联成立后,内设党组性质的党团,第一任书记是冯乃超,成员有华汉(阳翰笙)、夏衍、钱杏邨等人。其时文委书记已由朱镜我担任。到一九三一年二月……朱镜我叫我去接替左联书记,冯乃超调任文委书记。一九三一年下半年,祝伯英任文委书记,冯乃超另调工作(冯大约在一九三二年初去了武汉)。一九三二年我调任文委书记,阳翰笙接左联书记。一九三三年上半年我调中宣部,阳翰笙任文委书记,一直做到一九三五年初。一九三三年上半年左联书记仍由阳翰笙兼任,下半年开始才是周扬。一九三五年二月阳翰笙被捕,周扬接文委书记,兼左联书记。听说一九三六年间任白戈担任过左联书记,此事我不大清楚。有人说周立波也当过左联书记,这不可能。^④

此外,在他1968年所写的“外调材料”中也有不少对此的回忆。如1968年1月22日回忆说:“1931年1月和2月间左联柔石等人被捕和被杀时,文委书记可能是朱镜我,左联党团书记是冯乃超。这事件后,即在2月间我调去做左联党团书记,冯乃超调为文委书记。……1931年下半年文委书记是祝伯英。1932年文委书记是我。1931年2月后的左联党团书记是我。32年左联党团书记是阳翰笙。”^⑤在冯夏熊整理的《冯雪峰谈左联》中说:“1930年左联的党团书记是冯乃超,成员有夏衍、阳翰笙、阿英等。1931年2

月后左联党团书记是冯雪峰,成员有夏衍、阳翰笙、阿英、彭慧等。1932年左联党团书记是阳翰笙,成员有夏衍、阿英、彭慧等。1933年左联党团书记是周扬,成员有夏衍、彭慧。”^⑥可以看出,冯雪峰在不同的时间段对左联时期的文委书记、左联党团书记的回忆基本上是一致的。

总体来看,冯雪峰回忆的前半段,即1932年前的情况大致是可靠的,而后半段的回忆是他调文委、中宣部、江苏省委工作,甚至是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之后间接了解的情况,所以与事实有较大的偏差。如认为阳翰笙之后接任左联党团书记的是周扬。这之间起码还隔着钱杏邨和丁玲。钱杏邨回忆说:“一九三二年在我进入电影界之前,也曾担任过很短一段左联党团书记。到党的电影小组后,我一度还兼任左联常委和党团组织成员。”^⑦丁玲也回忆说:“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以后,钱杏邨任左联党团书记,阳翰笙在文委。……一九三二年下半年,钱杏邨不当党团书记了,左联的党团书记就由我来担任,一直到一九三三年五月我被捕。”^⑧此外,胡风、阳翰笙等人也曾忆及丁玲、钱杏邨任左联党团书记的情况。这里丁玲所说的“一九三二年下半年”接替钱杏邨任左联党团书记的事我们下面再讨论,但可以确认的是,钱杏邨与丁玲在阳翰笙之后、周扬之前曾经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这在冯雪峰的回忆中被漏掉了。徐懋庸曾回忆说:“一九三四年秋,即在我卸去《新语林》编辑之后不久,我被选入左联常委会,担任宣传部长。次年春,在田汉、阳翰笙等被捕以后,原来担任左联书记的任白戈去日本,由我接任书记。”^⑨这里徐懋庸所说的“左联书记”,不是左联的党团书记,而是左联的秘书处书记,有人称秘书长,有人称行政书记。冯雪峰把听说的任白戈担任过左联秘书处书记,误认为是左联的党团书记。且把时间说成是任白戈已经去了日本的1936年。这显然出现了舛误。

阳翰笙在回忆中也给出了一个曾任左联党团书记的人员名单与时间次序:

潘汉年(一九三〇年三月开始,后来他可能调到中宣部去工作)

冯乃超(为时较短,后来可能调到武汉作别的工作)

阳翰笙(一九三〇年下半年——一九三二年下半年。后调至中央文委和“文总”)

钱杏邨(时间也较短)

冯雪峰

叶林(又名耶林,后来去苏区,在王明路线搞肃反扩大化时牺牲)

丁玲

周扬(一九三三年下半年开始)^⑩

阳翰笙提供的版本,把冯雪峰版本中明显遗漏的钱杏邨、丁玲补充了进来,看上去比较详尽,由此得到了一些人的认可。如王宏志认为“这名单似乎较可靠”^⑪。姚辛在《左联史》中表示:“先后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的有冯乃超、阳翰笙、钱杏邨、冯雪峰、耶林、丁玲、周扬。”^⑫这是一个排除了潘汉年的阳翰笙版本的照录。其实,阳翰笙提供的版本也存在着明显的误记与缺憾。其中明显的误记就是把潘汉年误记为左联的第一任党团书记。潘汉年是以文委书记的身份代表党领导、策划和推动左联成立的,他当时就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的书记,不是像阳翰笙所记的“后来他可能调到中宣部去工作”。他并不像此后的冯乃超、冯雪峰和阳翰笙等人,是先任一段左联党团书记后再升任文委书记的。左联时期与潘汉年熟识的一些当事人如李一氓、冯雪峰、夏衍、丁玲等,在回忆或纪念潘汉年的文章中,都说他是文委书记,没有人说他曾任过左联党团书记,反之,在冯雪峰、夏衍的回忆中都肯定冯乃超是第一任左联党团书记。如前面提到的冯雪峰的版本中明确说左联党团“第一任书记是冯乃超”。夏衍也说“左联第一任党团书记是冯乃超同志”^⑬。冯乃超在1979年11月21日写给上海师范学院图书馆资料组的函中也表示:“据冯雪峰的回忆,我是‘左联’第一任党团书记,这大概是事实,因为筹备‘左联’及‘左联’成

立之后的一年间,我做的工作比较多,华安大厦一次‘左联’大会,是我主持的。”^⑭就以上材料分析,基本上可以判定阳翰笙把潘汉年列为左联的第一任党团书记是一种误记。此外,阳翰笙的版本中,除了对他自己和周扬的任职提供了大致的时间段之外,对其他人都没有提供任职时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明显的缺憾。

我们认为,要研究左联党团书记的任职情况,首先要把冯雪峰与阳翰笙这两个提供基本信息的重要当事人的任职情况弄清楚,而二人任职的先后又是冯、阳两个版本中存在的突出的矛盾与问题。判断冯雪峰与阳翰笙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先后次序,不妨参考一下当时文委书记与委员的任职情况。据《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记》刊出的《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共上海文委系统组织沿革概况及成员名单》列出的文委书记及成员名单,可知当时文委书记与委员的前后任职顺序是:1929年10月至1931年2月,文委书记相继是潘汉年和朱镜我,此间冯乃超是文委委员之一;1931年2月至1932年1月,文委书记相继是冯乃超和祝伯英,此间冯雪峰是文委委员之一;1932年1月至1933年1月,文委书记是冯雪峰,此间阳翰笙是文委委员之一;1933年1月阳翰笙接替冯雪峰任文委书记,此间周扬是文委委员之一。^⑮这个名单与冯雪峰版本提供的文委书记的任职情况基本相符,即冯雪峰任文委委员和书记都在阳翰笙之前。当时的“文总”秘书季楚书回忆说:“‘左联’是‘文总’的三大支柱之一。‘文总’领导机构主要是由‘左联’、‘社联’和‘剧联’的盟员组成。”^⑯文委的组成情况与“文总”相似,文委委员多是左联或社联的党团书记或执委。而且一般文委书记也都由这两个社团的党团书记升任。如社联党团书记朱镜我接任潘汉年做文委书记,此后左联党团书记冯乃超、冯雪峰、阳翰笙和周扬都升任了文委书记。因冯雪峰担任文委委员和文委书记都在阳翰笙之前,由此可以推断他任左联党团书记也是在阳翰笙之前。

在明确了冯雪峰与阳翰笙的先后任职次序之

后,我们可以把左联党团书记的任职情况,以1932年1月冯雪峰调任文委书记,阳翰笙接任左联党团书记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来考察。前期冯雪峰作为左联的发起人之一,还特别肩负着党组织与鲁迅的联系人的重要角色,且在1931年2月接替冯乃超担任左联的党团书记,直至次年1月调任文委书记。而此后,他相继调任文委书记、上海中央局宣传部干事、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1933年底又远离上海去了中央苏区瑞金。所以,冯雪峰提供的左联党团书记的信息,1932年前是链条清楚大致可靠的,此后则粗疏简单有诸多遗漏。而阳翰笙自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后直至1935年2月被捕,此间他相继任左联党团书记、“文总”党团书记、文委书记。所以这个时期,阳翰笙是左联的实际领导人。所以阳翰笙提供的版本,前期可能出现了误记,但后期列出的人员名单应该是大致不错的。其缺憾是没有给出每个人的具体的任职时间。

二、学界不同观点的互校与辨正

就笔者所见,目前对左联党团书记的任职情况真正认真做了考释工作的是周国伟和王锡荣。周国伟比较肯定阳翰笙提供的版本。周国伟考释工作的目标就是消除阳翰笙版本中存在的误记与缺憾。所以他在排除了潘汉年是左联第一任党团书记这一明显误记之后,重点是要为阳翰笙版本中的人员提供任职时间与顺序。在采访当事人和分析史料的基础上,周国伟排出的左联党团书记的任职时间与顺序为:第一任是冯乃超,任职时间是1930年3月至上半年结束;第二任是阳翰笙,任职时间是1930年下半年至1931年2月;第三任是冯雪峰,任职时间是1931年2月至1932年3月;第四任是钱杏邨,任职时间是1932年4月至5月;第五任是耶林,任职时间是1932年6月至同年冬;第六任是丁玲,任职时间是1932年冬至1933年5月;第七任是周扬,任职时间是1933年5月至1936年春左联解散。^⑩但王锡荣却认为周国伟考证的版本“有些说法的依据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⑪。确实,周国伟考证的最大问题就出现在对冯

雪峰与阳翰笙任职先后的判定上。周国伟认为:“第二任党团书记阳翰笙。他自述于1930年下半年起任党团书记,这是对的。但下限时间至1932年下半年就不对。下限时间约1931年2月。这里尚需说明的,阳和冯所任党团书记的先后问题。我们在京访问阳翰笙时,特地请教了他。他明确说:‘我任党团书记时,柔石是党团成员之一,常一起商讨‘左联’工作。’由此可见,阳翰笙所任党团书记的时间,无疑在冯雪峰之前。”^⑫可以看出,因周国伟是基本认同阳翰笙提供的版本的,在考论中不自觉地带有为阳版本做补充说明的思维定式,既想维护阳翰笙版本中阳先于冯做党团书记的次序,又要顾及冯版本中冯雪峰1931年任党团书记的说法已经被夏衍、丁玲等在回忆中做出了有力的佐证的事实,由此,做出阳翰笙1930年下半年任党团书记至1931年2月由冯雪峰接替的判断。周国伟在这个问题上的考论过分依赖于阳翰笙的回忆材料,他的论证证据几乎都源于阳翰笙。阳翰笙“自述于1930年下半年起任党团书记”的唯一证据就是忆起任党团书记时曾与党团成员之一的柔石一起商讨工作。对此,王锡荣认为“阳翰笙记忆中与柔石一起工作,应该是因为当时两人都是党团成员而非书记和成员的关系”^⑬。笔者认同王锡荣这一说法。也就是说,1930年下半年至1931年1月,左联的党团书记仍然是冯乃超而不是阳翰笙。

在冯雪峰任职左联党团书记的下限在什么时间这个问题上,按文委书记与文委委员的任职情况和冯雪峰的回忆,应该在1932年1月冯雪峰调任文委书记后即不再做党团书记。但周国伟依据1932年编的左联内刊《秘书处消息》(第一期)刊载的《秘书处关于竞赛工作的一封信》提出了不同意见。这封信附录了四个竞赛者琅琅(丁玲)、洛扬(冯雪峰)、凌铁(楼适夷)、原山(叶以群)自己制定的个人工作标准(自三月十五至四月底),其中洛扬工作标准中的第7条是:“负责建立秘书处工作,经常勤快的督促各委会及各小组的工作。”^⑭信末尾标注的时间是3月13日。依

此周国伟认为“1932年3月,冯还在负责秘书处工作”^②。并由此认为冯雪峰任左联党团书记的时间下限是1932年3月。对此,王锡荣质疑说:“至于冯雪峰在1932年3月的左联竞赛计划中出现并响应丁玲的挑战,并不代表他的身份。”^③王锡荣虽然提出了质疑,但却并没有进一步探讨说明为什么冯雪峰在卸任左联党团书记升任文委书记后,还要负责左联“秘书处工作”。1931年5月下旬,冯雪峰请茅盾担任了左联秘书处书记。但不到半年,茅盾为集中精力创作《子夜》而提出辞职,但冯雪峰批准茅盾请长假而不是辞职。既是请假,不好找人替代这个职务,冯雪峰只好自己亲自来做。

此外,在阳翰笙版本给出的左联党团书记名单中,排在冯雪峰之后,丁玲之前的是耶林。周国伟专门就此致函阳翰笙询问。“阳翰笙的秘书黄铭华询问了翰老后来信说:‘叶林同志任左联党团书记是由阳翰笙同志亲自安排的。当时翰老任左联党团书记,因奉命到文委工作,在离左联前,翰老安排叶林同志为左联党团书记。’”^④据此,周国伟认为耶林是第五任左联党团书记,任职时间是1932年6月至同年冬。对此,王锡荣提出质疑并基本予以否定。其一,他认为左联当事人中只有阳翰笙回忆耶林曾任左联党团书记,孤证不立;其二,周国伟考证耶林任左联党团书记的时间是1932年6月至同年冬,这和丁玲的任职时间冲突,且丁玲说她是从钱杏邨手上接任的;其三,丁玲对耶林曾任左联党团书记提出过质疑。由此,王锡荣认为“无论从哪方面说,耶林担任党团书记的可能性都很小”^⑤。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倾向于周国伟的说法。

首先,阳翰笙对耶林任党团书记不是模糊地提及,而是多次清楚地记述。他不但在回忆左联的文章和回复周国伟的函询中提到和肯定,还在专门的纪念文章中谈道:“叶林是我的老战友。我在‘左联’担任党团书记时认识他的,我们在一起工作过。后来,我被调到‘文总’和中共上海局文委工作,中央曾委派他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⑥考虑到当时左联

党团书记处于秘密状态知情人少的情况,而作为直接当事人的阳翰笙又对耶林任职的事多次提及,明确肯定,加之一些当事人的侧面佐证,耶林曾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可能性是较大的。

其次,周国伟考证耶林1932年6月至同年冬任左联党团书记,这和丁玲的任职时间并不冲突。丁玲说她接替钱杏邨任左联党团书记,此说却值得商榷。丁玲回忆说:“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以后,钱杏邨任左联的党团书记,阳翰笙在文委。……一九三二年下半年,钱杏邨不当党团书记了,左联的党团书记就由我来担任,一直到一九三三年五月我被捕。”^⑦在这段回忆中,人员更替,时间先后似乎交代得很清楚,所以王锡荣考察左联党团书记任职时认为:“一·二八事变后钱杏邨接替阳翰笙。而丁玲1932年下半年接任基本上无争议。”^⑧其实,很可能是丁玲的记忆有误。阿英回忆他1932年在进入电影界前曾担任过很短一段左联党团书记。当年大约是四五月间,明星电影公司希望找几位有点名气的作家去做公司的剧本顾问。由此,代表中央主管文化工作的瞿秋白决定派夏衍、阿英和郑伯奇趁此打进电影界。由阿英的回忆可以断定,他辞去左联党团书记大致在1932年的六七月间。而丁玲到底是从什么时间开始任职左联党团书记的呢?冯雪峰1962年11月14日接受采访时说:“‘左联’刚成立时,我在学校工作。年底(指农历,具体日期是1931年1月17日)五烈士被捕,调我到‘左联’担任党团书记。1932年下半年我到中央宣传部担任干事,负责文委工作。后调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文委也跟来。1933年上半年丁玲负责过‘左联’工作。同年下半年起由周扬负责,文委由阳翰笙负责。”^⑨这次采访中冯雪峰明确记述丁玲负责左联工作是在1933年上半年。11年以后在接受中山大学教师采访时则没有提丁玲任左联党团书记,而是说:“一九三三年上半年左联书记仍由阳翰笙兼任,下半年开始才是周扬。”因冯雪峰1962年的回忆比1973年的回忆早了11年,可信度更高。丁玲自己1980年特别写了《一点补正》:“《人

民日报》三月五日第五版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经过》一文中,谈到左联党团的情况,有一处与事实不符,即自一九三二年底到一九三三年五月中旬的这半年时间里,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是我,不是别人。近日我和阳翰笙同志同住医院,见面时,曾谈到此事。因为事隔多年,他记不太清楚了。周扬同志来看望我们时,他说他记得,他是在一九三三年五月之后,接替我而任左联党团书记的”^⑩。在1980年6月回答李华明等的采访时,丁玲也明确说:“一九三二年二三月份我入了党,在一九三二年底或一九三三年初,担任了‘左联’党团书记。”^⑪这和冯雪峰1962年回忆的说法一致。所以,丁玲是在1932年底或1933年初至1933年5月中旬任左联党团书记,这是经过当事人三头对案核对过的,是可以确信的。前面我们知道,钱杏邨大致在1932年的六七月间不再任左联党团书记。而丁玲又是在1932年底或第二年初才任此职,这之间有半年左右的空窗期。阳翰笙版本中所列的耶林的位置,恰好在钱杏邨与丁玲之间。所以,耶林的任职时间与丁玲的并不重叠,没有矛盾。而丁玲说她1932年下半年接替钱杏邨任党团书记则显然是有误差的。对此丁玲是做了“补正”的。阳翰笙多次明确说他安排耶林做党团书记,而耶林在1932年底或次年初离开上海去苏区时,丁玲被安排担任左联党团书记,这是合于逻辑的。所以,耶林是很有可能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的。

夏衍回忆说:“1931年春夏之间,‘文委’和‘左联’、‘剧联’的人事方面都有了一些变动,冯雪峰任‘文委’书记;‘左联’党团书记则因冯乃超调往武汉,由冯雪峰兼任了一段很短的时期,之后,由阳翰笙担任;翰笙当了‘文委’书记之后,‘左联’党团书记改由周扬继任。”^⑫王锡荣在质疑周国伟考证的左联党团书记任职情况的版本时,参照夏衍的这段回忆,同时又兼顾冯雪峰等人说的1931年初接替冯乃超任党团书记的说法,提出了他对左联党团书记任职情况的版本。即“1931年初冯雪峰任左联党团书记,不久冯乃超去武汉,冯雪峰接任文委书记,仍兼左联党团书

记,下半年阳翰笙接任左联党团书记,1932年2月冯雪峰转任上海中央局宣传部干事,主管文委,阳翰笙接任文委书记,钱杏邨接替阳翰笙任左联书记,不久由丁玲接替钱杏邨”^⑬。王锡荣提出的这个版本也值得商榷。

其一,表述不太严谨,时间节点不够明确。冯乃超是1931年3月,因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遭受严重破坏,被调去从事恢复编辑工作。直到1932年3月,才应时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的岳父李书城邀请,经潘汉年安排,以“特科”成员身份去武汉,进入国民党政府机关,任湖北省建设厅帮办秘书。^⑭显然,冯乃超被调去从事恢复编辑《红旗周报》工作后即卸任了文委书记,而不是因去武汉由冯雪峰接任文委书记。

其二,王锡荣认为1931年冯雪峰接替冯乃超任文委书记的说法也值得商榷。冯雪峰无论是接受采访,还是写“外调材料”,均明确表示自己是1932年初接替祝伯英任文委书记的。冯雪峰回忆中具体的时间点,甚至当时的文委成员都回忆出来了。且回忆的情况与《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记》中的《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共上海文委系统组织沿革概况及成员名单》所记述的祝伯英与冯雪峰的任职情况相符。

其三,王锡荣版本所说1931年“下半年阳翰笙接任左联党团书记”的说法也值得商榷。“下半年”的时限很宽。我们已经多次举出冯雪峰明确记述自己1932年1月任文委书记,左联党团书记由阳翰笙接任。王锡荣自己也说:“有证据表明,1931年11月左联的决议是冯雪峰起草的(夏衍说这个决议是‘执委会决定由冯雪峰起草’的。据《懒寻旧梦录》,第208页;茅盾也回忆冯在鲁迅家谈到写这篇决议的事,瞿秋白也参加了意见),那么当时冯应该还在左联。”^⑮这里说的“决议”即左联于1931年11月召开执委会所通过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既然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冯雪峰1931年11月还肯定做党团书记,冯雪峰自己也多次肯定自己1931年任左联党团书记,且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表

明在当年11月至12月期间阳翰笙接任了冯雪峰的党团书记。

其四,王锡荣版本中“1932年2月冯雪峰转任上海中央局宣传部干事,主管文委,阳翰笙接任文委书记”的说法也值得商榷。按冯雪峰1968年5月30日写的“外调材料”,他“1930年在左联工作;1931年做左联党团书记;1932年做文委书记。1933年1月至5月在上海中央局宣传部做干事,6月至11月初在江苏省委做宣传部长”^⑤。按前面提到的他在接受中山大学教师采访时说:“一九三二年我调任文委书记,阳翰笙接左联书记。一九三三年上半年我调中宣部,阳翰笙任文委书记。”二者是相符合的。而且,阳翰笙本人认为任文委书记是在“一九三二年下半年到一九三五年初”^⑥。他所记的“下半年”倘若“下”到年底,则与冯雪峰说的1933年1月调中宣部,阳翰笙任文委书记大致相合。由此看来,“1932年2月冯雪峰转任上海中央局宣传部干事,主管文委,阳翰笙接任文委书记”的说法是与当事人的回忆及已有的研究成果相左的。

其五,王锡荣版本中“不久由丁玲接替钱杏邨”任党团书记的论断,前面我们已经论证过,钱杏邨大致在1932年6月至7月间辞去左联党团书记,而丁玲确定开始任左联党团书记的时间,是1932年底或1933年初,二者有大约半年的间隔。这之间应该还有人担任此职。阳翰笙自述是在1930年下半年至1932年下半年担任左联党团书记。此后调任文委和“文总”的书记。可前面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表明,1930年下半年至1931年的党团书记相继是冯乃超和冯雪峰。冯雪峰多次记述1932年党团书记是阳翰笙。可是丁玲则记述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党团书记是钱杏邨,此后是她。钱杏邨的任职也得到了本人的证实。这样,阳翰笙任左联党团书记的时间只可能是在冯雪峰与钱杏邨之间。其实,冯雪峰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后接替祝伯英为文委书记后,左联党团书记即由阳翰笙接任。不久,阳翰笙又被调到“文总”做党团书记。这样一来,阳翰笙

既负责全面领导“文总”又兼任左联党团书记,二者兼顾起来可能非常紧张。所以他在四五月间即安排钱杏邨接任了左联党团书记。六七月间钱杏邨去明星电影公司后,耶林接任党团书记。耶林年底被派去苏区后由丁玲接任。丁玲被捕后则由周扬接任。这期间阳翰笙在冯雪峰1933年2月调中宣部后,升任文委书记并兼“文总”党团书记。直至1935年2月他被捕。阳翰笙之所以给人担任左联党团书记比较长的印象,是他担任左联党团书记、“文总”党团书记和文委书记总体时间比较长,所以在人们印象中他领导左联的时间比较长。而他真正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时间并不长。

结论

以上笔者参考当事人的回忆及《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记》中的《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共上海文委系统组织沿革概况及成员名单》等相关研究成果,把左联党团书记的任职情况以1932年1月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来考察,前一个阶段以冯雪峰提供的版本为蓝本,后一个阶段以阳翰笙提供的版本为蓝本。在此基础上,推定曾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成员及任职时间的简要概况如下:左联党团书记第一任是冯乃超,任职时间是1930年3月至1931年2月;第二任是冯雪峰,任职时间是1931年2月至1932年1月;第三任是阳翰笙,任职时间是1932年1月至1932年四五月间;第四任是钱杏邨,任职时间是1932年四五月间至1932年六七月间;第五任是耶林,任职时间是1932年六七月间至同年末;第六任是丁玲,任职时间是1932年末或1933年初至1933年5月;第七任是周扬,任职时间是1933年5月至1936年春左联解散。

注释:

①夏衍:《“左联”成立前后》,会林、陈坚、绍武编:《夏衍研究资料》上,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第54页。

②茅盾在回忆录中说鲁迅是“‘左联’执委会常委书记”(参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15页)。这种说法在相关的资料与文件中没有见到,其他的

左联当事人也均未提及。胡风表示“从没有听说左联有常务书记”(《胡风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茅盾没有参与左联的筹备与成立,他是1930年4月从日本回国后才由冯乃超介绍加入左联的,所以对最初左联的组织设置可能不太了解。他说的所谓“执委会常委书记”,就像许多人把鲁迅作为左联的旗手或盟主一样,是基于鲁迅的影响与威望的一种想当然式的认知。

③阿英:《阿英忆左联》,《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④《冯雪峰同志关于鲁迅、“左联”等问题的谈话》,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资料2》,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167~169页。

⑤冯烈、方馨未整理:《冯雪峰外调材料》(上),《新文学史料》2013年第1期。

⑥冯夏熊:《冯雪峰谈左联》,《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⑦吴泰昌:《阿英忆左联》,《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⑧丁玲:《关于左联的片断回忆》,《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⑨徐懋庸:《我和鲁迅的关系的始末》,上海鲁迅纪念馆编:《回忆鲁迅在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版,第593页。

⑩阳翰笙:《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经过》,《文学评论》1980年第2期。

⑪王宏志:《鲁迅与左联》,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页。

⑫姚辛:《左联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⑬夏衍:《“左联”成立前后》,会林、陈坚、绍武编:《夏衍研究资料》上,第62页。

⑭上海师范学院图书馆资料组辑:《“左联”盟员谈“左联”——部分“左联”盟员来函辑录》,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纪念特辑》,新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137页。

⑮参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记1937.7-1949.5》,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81~282页。

⑯季楚书:《纪念“左联”,缅怀战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左联回忆录编辑组编:《左联回忆录》,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158页。

⑰周国伟:《“左联”组织系统史实考》,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编:《左联论文集》,百家出版社1991年版,第235~236页。

⑱王锡荣著,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鲁迅纪念馆编:《“左联”与左翼文学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1页。

⑲②周国伟:《“左联”组织系统史实考》,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编:《左联论文集》,第233、234页。

⑳王锡荣著,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鲁迅纪念馆编:《“左联”与左翼文学运动》,第103页。

㉑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纪念特辑》,第29页。

㉒⑤王锡荣著,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鲁迅纪念馆编:《“左联”与左翼文学运动》,第102页。

㉓周国伟:《“左联”组织系统史实考》,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编:《左联论文集》,第233页。

㉔阳翰笙:《我的老战友叶林》,张以谦、蔡万江编:《耶林纪念文集》,山东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19页。

㉕丁玲:《关于左联的片断回忆》,《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㉖王锡荣著,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鲁迅纪念馆编:《“左联”与左翼文学运动》,第102页。

㉗孔海珠:《冯雪峰在1962年的一次谈话》,《沉浮之间上海文坛旧事二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6年版,第266页。

㉘王增如、李向东编:《丁玲年谱长编》(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63~564页。

㉙丁玲:《“九·一八”和“一·二八”期间我在上海参加的几次抗日救亡活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2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下》,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800页。

㉚夏衍:《懒寻旧梦录》,《夏衍全集》第15卷,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

㉛⑤王锡荣著,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鲁迅纪念馆编:《“左联”与左翼文学运动》,第103、102页。

㉜参见李江《冯乃超年谱》,李尚德主编:《默默的播火者冯乃超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㉝冯烈、方馨未整理:《冯雪峰外调材料》(下),《新文学史料》2013年第2期。

㉞阳翰笙:《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经过》,《文学评论》1980年第2期。